

“一带一路”的文明叙事与世界意义

张柏榕

(浙大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既是深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也是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叙事载体。十年来,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生成了以共同发展为优先的物质文明叙事、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政治文明叙事、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宗旨的精神文明叙事、推动普惠、包容、平衡的社会文明叙事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叙事。面对国际形势新变化,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文明叙事体系,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影响,具有现实性国家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文明叙事揭示了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帮助后发国家破解边缘化的瓶颈,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多元文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文明叙事;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要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明确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1][3]}。2023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应携起手来,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在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我们不仅需要从经济实践、政治交往层面总结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就与经验,更需要站在文化交流、文明发展层面,梳理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生成的文明叙事资源。

2023年10月,《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3]。共建“一带一路”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也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议题常被国际媒体歪曲,选择性建构出“经济侵略论”“债务陷阱论”等敌意叙事,有意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良性互动上升到国家竞争和文明冲突层面,渲染“中国威胁论”^①。“一

[收稿日期] 2023-08-2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3-12-25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3AKS006)

[作者简介] 张柏榕(<https://orcid.org/0009-0006-3574-2823>),女,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 关于西方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参见 Ahmed F. & Lambert 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A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21; Mações B., *Belt and Road: A Chinese World Order*,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9。

“一带一路”文明叙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国际面向,不同国家利益取舍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无形中增加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叙事传播的不确定性。在复杂多元的国际认知背景下,如何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在世界意义上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文明叙事体系,已成为一项现实性国家战略。因此,阐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文明观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叙事破解“债务陷阱”“文明冲突”等敌意叙事,彰显“一带一路”倡议对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有效应对“一带一路”的话语陷阱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文明观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贯穿历史与当代,融通中国与世界,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文明观,蕴含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主张。从文明论的视角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原则,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把握,深化对“一带一路”文明叙事意蕴的挖掘。

文明是一系列具体而生动的实践产物。从历史上看,欧洲文明论衍生于启蒙运动揭橥的理性主义话语,是资本主义为满足资本原始积累与殖民贸易而构建起来的特殊知识形态。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逐步成熟,19世纪欧洲文明等级论与文明优越观念随着坚船利炮上升为所有主权国家的“政治无意识”。德国法学理论家卡尔·施密特指出:“从16世纪到20世纪,欧洲国际法始终主张,基督教民族不仅创造了一套适用于整个地球的秩序,而且还代表此秩序。‘欧洲’这个概念意味着正常态,它替地球上所有不是欧洲的地方树立起一套标准。文明除了欧洲文明之外,别无他指。”^①欧洲文明被上升为“普世”标准,生成对外压迫性的知识与话语实践,阻断不同文明主体间的正常交流。对于西方文明观的虚假叙事,马克思从人的社会交往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入手,阐发文明的一般与多元特征,强调文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明的更迭在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否相适应^{[4]267}。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文明”的批判,揭示了新的文明形态无法从抽象人性和社会的观念中构建,而只能孕育在资本主义内部所形成的主客体要素中。不同于欧洲文明观,“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互鉴之路^[3]。文明在不同维度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包含了文明的历时性、共时性以及主体性维度。

(一) 历时性视角:以互联互通推动文明的历史进步

文明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进步的,现代文明随着世界市场的互联互通而形成和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5]401}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得以往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逐渐被各民族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引领了世界交往的趋势。由此可见,文明互联互通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面对沉渣泛起的逆全球化思潮,“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进一步打通经济全球化的大动脉,从而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以建设高效互联的国际大通道,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为各民族和国家进一步互联互通提供便利,从而推动文明的历史进步。

^① 转引自刘禾《国际法的思想谱系:从文野之分到全球统治》,见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8页。

(二) 共时性视角:以平等合作维护文明的多元格局

文明的形态是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每个民族都要基于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来推动本民族文明的发展,反对一个文明标准,反对强势文明的压迫。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以“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的西方中心主义通过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将空间差异视为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文明的等级制度应运而生。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欧洲文明史、国际法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文明等级论的塑造。基佐、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以种族意识、政治立场及宗教与文化价值观念等多重不平等视角,构建世界文明秩序的进步主义幻象,捍卫欧洲的文明优势地位,忽视非欧洲文明实存的多样性,掩盖了西方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剥削。不仅如此,西方中心论进而将文明优越论引向具有政治意义的制度优越论,诉求建立对全球文明秩序的霸权统治,“这种错觉不仅蒙蔽了西方文明的后代,也蒙蔽了其他所有已知文明和原始社会的后代”^{[6]892}。世界其他文明被迫成为西方文明不平等的附庸,然而西方文明因其固有矛盾,无法成为人类文明普遍性的代表,阻碍了世界各文明主体的平等交流,影响世界多元稳定的格局。“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7]在特殊利益基础上不可能建立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人类文明秩序,只有以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为基础,尊重文明的主体性和多元性,才能实现文明的繁荣共生。“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及文明共生论的具体践行,强调在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基础上实现不同文明体的共同发展,推动形成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新局面。在个别国家固守意识形态对抗、炮制“文明冲突论”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又体现了构建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基本原则的新型文明关系,实现人类文明创新发展。

(三) 主体性视角:以人类幸福彰显文明的价值底色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文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文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唯心主义史观从观念出发解释文明范畴,以神圣意志和经验论代替现实的人为考察前提,将文明进步的原因归结为抽象观念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建立在抽象价值观念上的文明进步论实质上是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更进一步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文明的发展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延续阶级对抗,对外更是服务于资本扩张和殖民侵略。马克思、恩格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从人自身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探寻文明的发展。人类文明本质性地演化于现实个体的劳动之中,劳动给人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和场所,只有通过生产劳动才能使人的本质力量外化为对象性产品,人的能力也随之得到确证与发展。文明的进程不是从思维到思维,不应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应从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文明进程是“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文明发展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创造,也不是为了满足资本的价值增殖需要,“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8]2}。“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以资本价值增殖为核心逻辑的突破,也是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文明实践的探索,在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文明进程中,始终尊重人的主体性,依靠各国人民共同建设,服务于各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对上述历史观、文明观的深化。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中国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起双边、多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通过建立广泛而稳定的全球利益联系,形成发展成果共享、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现实

基础。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扩充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面向，在十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文明叙事。

二、“一带一路”文明叙事的丰富内涵

“一带一路”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致力于形成国际社会利益合作的新空间，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容叙事的重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历史性生成了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独特叙事，以开放透明的互动合作回应少数国家的唱衰抹黑，促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播和发展。

（一）以共同发展为优先的物质文明叙事

实现富裕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目标。促进物质文明繁荣，让财富为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工业革命为引擎的西方现代化缔造的繁荣物质文明，本质上建立在对其他文明的非正义剥夺之上。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展失衡、治理滞后等突出问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北经济差距。“一带一路”沿线以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的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为主，各国之间发展差距较大，投资动能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处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边缘。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在经济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中，诞生了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的可持续性国际合作新范式。然而，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歪曲为以过剩产能输出为目的的“新殖民主义”，渲染“中国威胁论”^{[9]4-35}。“新殖民主义”概念本身与西方国家殖民历史一脉相承，是基于自身霸权主义立场对“一带一路”的横加指责。中国从未有过殖民历史，也不存在殖民主义的延续。共建“一带一路”不走剥削掠夺的殖民主义老路，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不搞“中心边缘”的依附体系，更不转嫁问题、以邻为壑、损人利己^[3]。“一带一路”倡议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短板，为共建国家打造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旨在以共同发展的物质文明合作助力共建国家去殖民化，超越地区霸权主义和“丛林法则”，为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推动各国共同走向现代化作出贡献。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中国以全球发展倡议为核心，与相关国家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断加强同东盟、欧盟的经贸关系发展，深化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物质文明实践。一方面，坚持共同发展优先，积极探索国际经济合作的创新驱动，通过各经济体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打通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渠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倡议各国结合自身国情，发展开放型经济，以基础设施、经贸投资和民生项目建设为抓手，不断扩大粮食、能源、投融资、医疗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共同创造有利于沿线各国开放发展的周边环境，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扩大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以共同发展为优先的物质文明叙事，彰显了倡议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初衷^①。

（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政治文明叙事

在既有国际关系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历史不平等的基础上。同质性民主话语、单边主义大行其道，不仅在不同国家、宗教、文化间产生持续不断的分裂和冲突，更成为西方大国谋求

^① 近年来，在国内外学者的合作下，研究主要聚焦“一带一路”促进世界发展等国际热点问题，参见蔡昉、[英]彼得·诺兰主编《“一带一路”手册·202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形成先发现代化优势国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和掠夺,为前者的粗暴干涉、破坏甚至颠覆他国政权提供便利。随着新全球化体系的出现和南南合作的深化,以邻为壑、你输我赢、排他结盟、独占独享等陈旧观念和做法已不合时代潮流,成为互联互通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阻碍因素。国际关系中的权利、利益、责任等概念需要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被重新界定,“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10]。改变过去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国际等级秩序,建立以尊重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实现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和谐共存,对构建国际新秩序至关重要。

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国际法为基础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然而,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基于以传统安全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地缘政治扩张角度阐释“一带一路”倡议,以零和博弈思维解读共建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无视“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为中心,以合作共赢的政治互信为起点,目的是寻求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突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虽然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存在不同政治体制,但有着和中国同样的为实现复兴而奋斗的民族解放历程。“共建‘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行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面的私家小路,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也不搞基于意识形态标准划界的小团体,更不搞军事同盟。”^[3]“一带一路”倡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搞阵营对抗;以政治互信、互利合作、平等相待、公平正义为原则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反对为一己私利损害他国正当权益^[11]。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治理上,各国共同享有平等的制度性权力、开放包容的治理空间、平等参与的治理原则,通过民主协商解决不同问题领域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参与国共同协商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超越政治差异的多元合作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更避免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不平衡发展。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非但没有西方媒体炮制的所谓“新版中华朝贡体系”,而且与个别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的霸权主义行径有着根本不同。“一带一路”创新了人类政治文明合作新范式,以更加包容的南方型全球化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单向度霸权格局,顺应了新兴发展中国家革新国际治理体系的强烈诉求,共商共建共享等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被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也得到更多认同。国际法学家伯特兰·巴迪的评价恰如其分:“南南轴心的建构——比过去更加务实、更少意识形态化,但可能更高效、更有前途——着实成为国际关系演进进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12]68}

(三)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宗旨的精神文明叙事

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各文明间的相互依赖与交流取代了以往的闭关自守,不同文明之间的共通性越来越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学者主张未来国家间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由经济因素而是由文化差异主导,“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3]105}。“文明冲突论”通过夸大不同文化、文明的差异性,重新塑造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二元对立的地缘政治格局,西方国家以一种隐性霸权的方式主导,将文化差异推向不同民族和国家利益冲突的前沿,在“一带一路”践行过程中不断鼓吹“文明对抗”“中华文化殖民论”等错误认知,诋毁“一带一路”合作中的正常文化交流。不同文明之间虽存在差异,但文明差异在文明的良性互动中所引起的冲突是暂时的,并不必然走向对抗。相反,文明多样性有助于增进文化理解,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提供了可能。在全球化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并不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所说的具有优势的西方文明,而是能够超越文明差异、具有人类

共通性的更高层级的新文明。当前国际局势复杂严峻、变乱交织,随着更多后发展国家不断寻求自身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重建超越文明冲突的世界性价值共识的需求呼之欲出。

作为中华文明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融合,“一带一路”倡议传承弘扬丝路精神,既与中华文明守正创新、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相承袭,又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品格相贯通,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集中呈现。中国在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顺应时代要求,以面向文明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宗旨,加强文明对话,理解并尊重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反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党同伐异。共建“一带一路”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新性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所形成的精神文明叙事提倡共生、平等、多元的文明观念,在共建国家民众中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顺应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多元趋势。

(四) 推动普惠、包容、平衡的社会文明叙事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破解各国难题、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然而,少数发达国家将发展议题政治化、边缘化,通过极限制裁、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等方式,使全球发展陷入巨大困境。《2020年世界社会报告:剧变世界中的不平等》指出,技术创新、气候变化、城市化和国际移民四方面的相关因素成为加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①。面对促进全球发展的人类社会重大课题,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重视民生福祉,“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致力于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中国方案。然而,近年来,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质疑“一带一路”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杂音增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以中低收入国家为主,投资动能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劳动参与率较低,失业率较高,就业不充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深化合作,以投资项目的形式直接吸纳本地就业,改善各国民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为弥合国际“免疫鸿沟”,中国倡议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守护各国人民生命健康;中国高度重视债务可持续性,提高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提升债务风险管理水平,没有一个国家因参与“一带一路”而陷入债务危机^②。参与国以人文交流实施更高水平的教育互联、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各领域的合作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一带一路”倡议以普惠、包容、平衡的社会文明叙事澄清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有关“债务陷阱”的错误认知。

(五)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叙事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以无限扩张的资本积累为逻辑,不仅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更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立在非正义基础上。中国主张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新突破。“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生态环境脆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更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中国就非常重视推动共建国家实现绿色发展。2015年3月28日,在《推

^① 参见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World Social Report 2020: Inequal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20/02/World-Social-Report2020-FullReport.pdf>。

^② 2020年,中国积极响应G20缓债倡议,缓债额超过13亿美元,占G20缓债总额近30%,是G20中贡献最大的国家。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中国明确提出要“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呼吁沿线各国推动环境立法,将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项目选择、实施和管理全过程,从而实现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①。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统筹沿线各国生态文明建设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需求,从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出发,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使生态文明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助推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响应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带动共建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生态治理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揭露了污染环境论调的荒谬。

“一带一路”文明叙事在国际视野中彰显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新思路,健康、绿色、创新、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的积极进展有力证明了交融互鉴、共生共存才是人类文明应有的生存秩序。“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拥有共同的命运,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14]190}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必须融入文化、社会、习俗、信仰和日常生活的各种形式之中,才能构建开放包容的文明与发展秩序。

三、“一带一路”文明叙事的世界意义

“一带一路”文明叙事生成于对既有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体现。近些年来,少数西方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带一路”合作,将债务陷阱、环境污染、腐败等污名化说辞强加给“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抓手,“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建立在追求透明公开原则的基础上,代表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探索。从性质上看,“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倡议,更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助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文明叙事的世界意义不在于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所谓唯一正确的“世界标准”,而是致力于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拓展对人类文明共存的想象空间。从全球发展五百年的历史逻辑看,“一带一路”文明叙事生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力求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干扰,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世界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从实践逻辑看,“一带一路”文明叙事通过总结发展中国家探索合作机制、规范对接、平台共享等的经验,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有效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一) 为后发国家破解边缘化瓶颈提供了新方案

现代化是各国的共同期待和目标,追求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与西方文明叙事有着根本不同,“一带一路”文明叙事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共商共建共享代替强权政治。“一带一路”文明叙事是对全球发展倡议的普遍阐释,为处在世界经济格局边缘位置的后发国家克服发展鸿沟、破解边缘化瓶颈提供了新方案。当前国际社会面临气候变化、流行疾病、地区冲突、能源危机等多重威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如何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走自己的路,是有待破解的现实难题。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带有与生俱来的侵略性和内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4版。

在限度,显然不能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一带一路”文明叙事生成于“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拓展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融入世界发展的路径,提供了破解现代化建设难题的可能。

(二) 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打造了新样板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不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日益增长的国际公共产品的现实需求与落后的国际治理体系供给能力之间产生了矛盾。共建“一带一路”旨在破除零和博弈思维,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搭建有益于各国发展的稳定外部环境,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一带一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统摄,通过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为基本前提,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进一步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统筹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从而有效拓展世界治理体系变革的新视野。“一带一路”文明叙事展示了如何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于控制、扩张、对抗和谋霸的逻辑取向具有根本不同,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打造了新样板。

(三) 为超越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随着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国际舆论场上“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杂音不绝于耳。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非议,充满对中华文明的误解、对文明多样性的傲慢与偏见。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始终根植于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当然,各个国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实际存在的价值观冲突不可避免。但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趋势始终是交流和融合,寻求各国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并在此基础上做到文明交流互鉴,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积淀深厚,“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63}。“一带一路”文明叙事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作为包容、开放、普惠的全球经济理念倡议者的中国,更展现了旨在构建以跨越国界、相互成就、共同发展为价值体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叙事是全球文明倡议的具体呈现,为世界文明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了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2]。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带一路”文明叙事彰显了探索命运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构建共担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文明形态的努力,承载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人民对文明交流的渴望、和平安宁的期盼、共同发展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容叙事的重要践行,“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误解,中国追求的并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缔造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一带一路”文明叙事既体现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又形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和实践逻辑,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 [2]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2版。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发布》,《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1日,第1版。
- [4]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5] [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6—435页。
- [6]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7]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 [8]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第4—8页。
- [9] Hillman J., *The Emperor's New Road: China and the Project of the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0] 习近平:《同舟共克济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2版。
- [11] 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9月17日,第2版。
- [12] [法]伯特兰·巴迪:《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宗华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 [1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 [14]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89—191页。

Civilization Narrative and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ang Bairong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As a major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come a popula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a unique narrative carrier for China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Previous relevant research mainly expounded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on how to jointly build the Belt and Road with high quality as a proposi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build up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strategic narrative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relevant researche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23 is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acing international doubts and slander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eds to be raised to the level of a realistic national strategy of civilization narrative and world significance. Also,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o respond to the concer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unter the counter-narrative effectively. Based on the Marxist view of civi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dvocates connectivity to promote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equal cooperation to maintain the diverse pattern of civilization, and human happiness to highlight the value of civilization. In the ten years of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uilt up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its mission, gradually formed a Belt and Road civilization narrative system with rich connotations, and enriched the content narrative of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cluding: a material civilization with “common development” as the priority, a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consult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a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civilization of “inclusiveness, tolerance and balance”, and the pursui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not only achieved important results, but also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recent years, some countries have intentionally spread hostile narratives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disrupting healthy interactions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initiative. Facing new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e must build the Belt and Road civilization narrative system actively with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ffectively, and expand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Belt and Road civilization narrative is of great global significance. It not only helps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break the bottleneck of marginalization and build up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but also opens up new path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current multi-cultural context, which responds to the various fallacies surroun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ivilization narrativ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world significance

